

张朋朋
著

文字论



华语教学出版社
SINOLINGUA

文 字 论

张朋朋 著

华语教学出版社
SINOLINGU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字论/张朋朋著.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0200-324-8

I. 文… II. 张… III. 汉字—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H19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2677 号

文 字 论

- 作 者 张朋朋
责任编辑 贾寅淮
封面设计 王 博
出 版 华语教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68320585
传 真 (010) 68326333
网 址 www.sinolingua.com.cn
电子邮箱 hyjx@sinolingua.com.cn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920×650)
字 数 158 (千) 11 印张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0-324-8
定 价 28.80 元

让文字回归伟大与光明

毕可生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传递信息和表达思想的工具。从社会产生和发展的角度看，如果没有语言，人类只能是一种动物群体，只有人类脱离了叫声，有了语言，才产生了社会。究竟语言是怎样产生的，这是一个谜。有学者认为，可能最早是人类的基因发生了突变，所以才有了语言；也有人认为语言是在视觉符号或动作表情的配合下极为缓慢地产生的。是不是智人的出现，因为人类有了语言，才组成了社会？这都是古人类学家的推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社会必定是和人类语言的产生相伴随而来的，所以人类的语言是社会形成不可或缺的一种因素。

系统的文字遗存，至今可考的有埃及的象形文字、中亚苏美尔楔形文字、美洲的玛雅文字和中国殷墟的甲骨文。前三种都已失传，只有中国的甲骨文经过多次形体演变而发展成今日通行的楷书汉字。但是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现在可辨识的约有近两千个文字符号，所以文字的起源一定要比殷墟甲骨文还要早得多。东汉许慎认为文字源于结绳记事。考古学家们则认为既然最早的文字大都是象形字，则文字可能是源于图画。尽管文字记录了历史，但是至今的考古工作对文字的起源还仍然处于一种近乎扑朔迷离的估测之中。

文字的出现无疑改变了人类社会信息传递的时空局限。它远远超脱于语言那可怜的瞬息即逝的有限时空范围。对于人类的这样两种不同的社会工具，不同时代，人们对它们的社会意义有不同的估

计。最早谈论语言和文字的，可以说是西方的希腊学人亚里士多德。他在其著作中说：“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他完全没有感觉到文字的出现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等的变化。他这种文字观遂使其成为了以后欧洲逻各斯（语言）中心主义者的鼻祖。比他稍晚一些时候的中国西汉淮南王刘安，对于文字的出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在他与门客合著的《淮南子》中说：“昔苍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对于这个“天雨粟，鬼夜哭”，我们无论是作正面的还是作反面的理解，都说明文字的出现必然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惊天地、泣鬼神，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见，刘安的目光已经远比亚里氏高远和伟大得多！进入十七世纪，文字的出现已经和文明社会的进步水乳交融地共同发展了几千年，文字的威力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体现得十分明显了。

美国的社会人类学家 L. H. 摩尔根（1818—1881）在他的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说：“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出现和用象形文字写文章。”^①他对于文字的出现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已有了正面的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他的这种观点都加以赞同，而且在自己的相关著作中对摩尔根关于文字开启和创造了人类文明的伟大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②。

不过，几乎同时，欧洲却发生了“语言中心主义”的大兴起。稍后于摩尔根的索绪尔仍然坚持亚里氏的旧论，视文字为语言的附庸，坚持文字是表现语言和记录语言的！他完全无视文字两千年来，与人类智慧结合所创造出辉煌文明进步的显著事实。而由他的弟子汇集成书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更一时成为欧洲“语言学”的经典之作。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理论由一些留学欧洲的学者传入中国。特别是反右前后，这种理论一与文字改革和汉字落后论相结合就形成一种学术霸权，反对者都会得到一顶‘右派份子’的政

① L. H. 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版，P. 11

② 均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

治帽子。然而奇怪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大师’索绪尔自己却并不承认这一理论适用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又说：“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表意的符号。”^①可是，甚至到了公元两千年之后，索绪尔学说的信奉者们仍然称颂他们的先辈中国大师们是获得了索绪尔嫡传门徒的“真传”！^②

尽管承蒙索绪尔比他中国的“真传”弟子谦虚谨慎得多，认为他的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的语文，那么就一定适用于欧洲的语文吗？我看也不一定。例如中国学生的哑巴英语备受诟病，但只要学够足量的词汇（最少一万五以上）和文法知识，一样可以阅读所需的外文书报和获得必要的外文资料。还如全世界所有的图书馆里都非常宁静，阅览拼音文字书刊的读者们并不是必定先“语”而后知意；相反，也是字形与字意发生直接联系，语音早被读者抛诸脑后了，如有人一定要见到字先“表现”一下“语言”，那么肯定他立刻会被逐出馆外。再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二战首相邱吉尔就曾以感激的心情回忆他在哈罗公学的英文老师如何教他们反复用各色笔分析文句构成，以至使他后来成长为著名的严肃文体大师。

其实，中文从甲骨文开始，当时是由于书写工具的原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字简意赅与语言脱离的文体，历三千多年而不衰，不论经、史、子、集无不以这种文体载之。尽管历代文体皆有演变，如所谓诗、辞、歌、赋、词、曲、记传、骈体、近体以至书信、日记等却无一不是当时口语的记录，这从来就无人怀疑。因为古人决不会是‘之乎者也’地说话。鲁迅创造的人物孔乙己整天地：“多乎哉，不多也！”那也只是对假斯文的讽刺。即使诗、词、歌、赋都有优美的音律，但这是文字与音乐的结合。如果一个人整天用诗、歌来说话，那他一定是个疯子，而且这些文体更重要的是包含在优美

① 以上引文均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章第51页。商务版。

② 见《索绪尔研究在中国》一书，商务版。P.8

铿锵的韵律中间的深邃动人的文字内涵。否则，就成了《红楼梦》里薛蟠的“一个蚊子哼哼哼，……”那样的东西了。所以，古人称：“文以载道”，而不说：“文以载语”。奉洋人为神明，而且还并没有完全学得洋人的精髓，这实在是近代学洋的末流。因为语言是人自然习得的技能（除了聋哑人）；而文字却是要经十年寒窗努力学习才能获得的本领。^①文字精妙的运用远比说话要难得多，所以杜甫才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相反，骂鸡的王婆大字可以不识一个，却能滔滔不绝。如果文字真地表现语言，岂不冤枉死苦读的学子？而全世界各民族又都努力以减少文盲率为荣干什么？！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大力提倡的白话文，虽说要明白如话，但也不是会说话就会写文章，它不过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文体而已，要写得好仍然要苦练文字运用的功夫！可是到上个世纪60年代，竟有惊世骇俗将“古文选读”称之为《古代汉语》者，给人以怪诞而恐惧之感，有如僵尸复活，知道古人当时如何说话。唯观其内容却丝毫无改于标注古文旧作。难怪著名华裔作家唐德刚先生，闻而惊讶不已，终以无可奈何地长叹息！^②更为不幸的还是现在有些高校竟有“汉语言系”（不是教外国人），好像是高中毕业生还要再上幼儿园！

错误的理论必然产生错误的认识和实践。凝聚着中国古人历时近四千年的智慧成果，通行于几乎整个东亚的汉字，竟先后被帝国主义份子改成拼音体的越南文、朝鲜文、缅文、蒙古文（西利尔字母）等。不学无术的福建人卢贛章也奴颜婢膝地大唱西文优越，“学会二十六个字母，拼法学会就会了英文”的无知怪论，当时也颇有些市场。而后来被斯大林批判的马尔学派更伪装成进步，指斥中文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③一时中文拉拼化的呼声，甚嚣尘上颇成气候。只是中文汉字是拼形表意文字，字音只有504个，即使算

① 见《论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张朋朋原发表于《汉字文化》05年第2期。现收入本书。

② 见1982年6月《编译参考》唐德刚关于汉字的讲话。

③ 见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译本。

上四声也只有1100个音，同音字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①喊了几十年终迄无所成。但是在中文教育方面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②造成了许多混乱，从文字的启蒙教育开始，一改数千年从分析字形表意入手去认识汉字的传统^③，而花费大量时间去教与汉字字形无直接关系的汉语拼音。^④以至学生高中毕业也难改同音错别字连篇的毛病。反过来却又成为文改先生们制造中文难学的口实，真是所谓又种蛊又卖饭，里外都是他们正确。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取消了文字改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开了真理探索的新局面。汉字落后论日益为有识者所不齿。特别是汉字进入电脑成功、激光照排印刷术的发明，彻底改变了汉字在工业机械化时代的落后面貌，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体系^⑤。只是索绪尔的错误理论和在中国文字上的错误应用仍然被某些人以非学术手段推崇为不可讨论的主流。如所谓“社会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他的专著《社会语言学》中，竟以轻蔑嘲讽的口吻对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字创造文明的说法，讥之为：“逻辑的倒置”^⑥。他根本就没弄明白，语言有如流沙，座落

① 1944年曾有人在胶东解放区推行过北方拉丁话拼音，但只限于写信。结果反而闹了很多笑话和问题。如：“时事”被误成“死尸”；“养羊”被误为“痒痒”等。不久就再没人使用了。

② 见周有光《文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版。第99页。原文如下。“用汉字来‘通词’，用口语来‘达意’；的确在过去没有感觉规定严格语音标准的‘必要’。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我们要用拼音字母注下读音、写下普通话。广泛地运用汉语拼音作为文字的辅助工具，将来并进一步使它发展成为通用的拼音文字。如果语音不规定严格标准，写下来也就没有一定的规范。……更阻碍了它将来发展成为通用的拼音文字了。”

③ 《说文解字·序》“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④ 当时小学一年级用于教汉语拼音和语音知识的课时竟高达八十课时。以后用于单字拼音教学的时间也不下于几十个课时，而学生用于抄写拼音和默写拼音的自习时间更不下于数百个小时。

⑤ 在电脑输入方面，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可进行非全息输入的文字系统。而且只用6763个汉字（国标2312字库现代使用的汉字总数）就可以组成无数汉字词汇和新词汇。激光照排完全改变了过去手工检字的落后面貌。

⑥ 见陈原著《社会语言学》学林版229页。原文如下：“就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说，应当倒过来，没有历史，没有文明，则文字根本就失去存在的价值，文字只是记载语言的工具，文字本身不可能创造文明。”

在这上面的人的思维或智慧转瞬就会“随风而去”(gone with the wind)。而文字则有如坚实的土地，它不光是记录了人类的智慧、经验、成果使其传之久、远，而且会使人类社会的一切思维活动、信息传递，系统化、集中化、抽象化、理论化并且可反复地进行智慧与经验的再思考、再创造、再研讨，从而产生更高级、更精练、更伟大的成果和发明！这就有如攀登高峰，一步步必须是落在坚实的基础上，在流沙上则只能原地踏步一样。因此，文明！文明！是文字创造了人类的文明！而不是语明！不是语言创造了人类的文明。

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天文学方面的例子。在16世纪哥白尼的日心说出台之前，地心说已经统治了西方天文学一千多年，而且还形成了一个似乎颇能自圆其说的托勒玫体系（尽管它也是用文字表示出来的，不是通过语言传述下来的）。当这种学说一与权势结合就在学术界形成一种可怕的停滞力量，于是伽利略因为支持哥白尼被审判，G·布鲁诺因为同情哥白尼而被烧死。随后丹麦人B·第谷用了20年，留下了他千辛万苦地观测行星运动的丰富的记录。如果文字就像陈原先生或者诸多语言学权威所说的那样，只限于记录语言或者也包括客观事物那样，那么伟大的日心说也许就会永远在第谷那里停顿不前了，可是事实是，后来的J·克普勒正是运用了第谷的资料在文字的帮助下反复进行了再分析、再研究、再思考，并加以综合，系统化，终于发明了著名的行星运动三定律。而后，牛顿又在这个基础上经过艰苦地努力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至此，地心说才算大势已去！但是直到19世纪，天文照像术的发明，弄清了恒星视差，发现了宇宙竟是超乎人们可能想象到的浩瀚而巨大，才使日心说终于完成了它无可辩驳的正确地位。经过两千年的斗争，地心说陈旧的‘公理’终于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不仅要问问陈原先生和语言学的大师们，难道这些成就都是可以用嘴巴说出来，再经过文字记录下来的吗？！

不错，现在世界上据说有三四千种语言（包括方言，但不包括

无法计数的方音)，而现有文字不过二百种。^①那是不是没有文字的民族就仍处于蒙昧社会呢？这有三种情况：第一，如中国，多民族共用一种文字体系（当然也包括历史上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诸多民族）。也如英国的威尔士、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及不列颠大英联邦诸民族共用一种大体相类的英文。第二，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发展自己的社会文明。如马来西亚借用中文、英文。第三，如太平洋诸小岛的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则仍处于落后的社会状况，但他们在二战后，借助于外来的文明，情况已发生根本改变。所以，文字与人类智慧的结合可以创造出伟大的文明，这一事实是无需置疑的客观真理！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文字和语言的理论与应用倍受欧洲“语言中心主义”的影响和侵扰，被弄得十分混乱。特别是“语言学界”的一些“学者”打乱了我民族只有文字学、音韵学的传统，标新立异创制语言学，并散布汉字落后论，散布中文拉拼化。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经过近20年的大争辩，中文在信息时代的成功，国家终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公布施行）确立了“规范汉字”为我国通用文字的永久地位。现在张朋朋先生的这本《文字论》可以说是近20年来对文字与语言理论中的错误和混乱澄清后的总其大成者。朋朋先生在欧洲从事汉语文教学，先后达8年之久，对于索绪尔和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的理论均有系统而直接深入的了解，特别是他在教外国人汉语和中文的实践中，重新对这些理论的正确性进行了实际的检验，从而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正确认识。所谓实践出真知，使得汉字从原来被误解为难学难认的一种文字回归为字形理据性极强的真正易学易认的文字。他否定了语文一体、语文并进的教学模式，创造了语文分开、语文分进的教学方法，为中文与汉语走向世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可谓功莫大焉！同时，他终于冲破多年洋泾滨式语言学的迷雾，从理论上打破

① 见（美）肯尼思·卡兹纳著《世界的语言》北京出版社。前言及序。

了“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的陈旧而错误的“公理”，使我们在这个领域找到了系统的真实！让文字终于回归到她的伟大与光明！！

八十社会学人欣然命笔于 06 年中秋前后

毕可生 社会学家、翻译家

1927 年生。1952 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毕业。80 年代社会学重建后，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分部副主编，社会学及老年学辞典副主编，《英汉辞海》执行编委，《英汉大学辞典》编委，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无正职）。

自序

—

对一个研究者来说，怀疑不仅是许可的，而且是他最首要的金科玉律，虔信对他的技艺来说是禁忌的。

——奥斯特瓦尔德

公认的意见和每个人都认为已成定论的东西，往往值得加以研究。

——希滕贝格

本书是由我的几篇研究语言文字的论文集合而成。因为论文对文字的基本概念，如文字的本质、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文字能力、文字单位以及文字教学的理念等都与传统的提法不同，所以起名《文字论》。

看到书名，一般人可能会认为我是专门研究文字的，其实不然，我是一生专门从事教外国人汉语和汉字的教师，今年是我的“耳顺之年”。

我怎么会文字的基本概念感兴趣呢？这得从我的经历谈起。

1972年当时我是北京汇文中学的一名年轻教师，一天，学校领导通知我去北京大学西语系去进修法语，说国家需要培养一批要到国外去教汉语的师资，于是我来到了北大西语系法语专业，一年后

被转到刚复校的“北京语言学院”继续学习法语和有关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知识。1975年毕业后我就留在北京语言学院成了一名正式的教外国人汉语的教师。

1988年我自费去法国留学。因为我在中国时曾在山东大学进过一年普通语言学、中国文字学和古代汉语等课程，这个学历法国教育部认可，于是我就直接取得了读语言学博士学位的机会。当时巴黎七大正在招聘一名教汉语的助教，条件必须是在读博士，我正好符合条件，再加上我在国内已有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所以最后我在十几位应聘者中胜出，被巴黎七大录用了，工作是教初级汉语课程。当时我身无分文，所以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因此，教学上比我在国内上课还要努力，但令我没想到的是，我的学生越来越少，期末时由开学初的五十多人减少到不到十人。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因为在国内时我的教学效果还可以，是受学生欢迎的，怎么到了法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有些不解，于是问学生为什么退学，为什么不学汉语了？是因为我教得不好吗？学生的回答令我感到意外，他们说不是因为我教得不好，他们都承认我是位好老师，他们说有的学生退学是因为汉语太难学了，他们坚持不下去了。学生们让我不要太自责，说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法国人遇到最难学的事情时常说的一句俗语就叫“C'est du Chinois !”（这就是汉语！）。

难道汉语就真的这么难学吗？我在法国时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一次我跟一位法国朋友去吃意大利面条，我看着这位法国朋友吃意大利面条的情景，差点儿乐出声来，法国人是用叉子把一根面条卷呀卷呀，卷半天才把一根面条放到嘴里，当时我心想法国人太笨了，怎么这么吃面条呀？用中国的筷子吃面条多方便，哪儿那么费劲呀！看来并不是面条难吃，而是吃的方法不对，如果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方法不对也会变难的，如果方法对了，难的事情也会变容易的。此时我联想到汉语教学，我想会不会是我们教汉语的方法有问题呢？会不会是我们教汉语的方法使汉语变得异常难学呢？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教材。因为在巴黎七大用的是由李森科（Nicolas Lyssenko）先生编写的教材，这套教材的特色是注意了汉字可以构词的特点，但教材主要是从提高阅读能力的角度设计的，所以不利于口语教学，于是我就和我的好友时任法国汉语教师协会主席的白乐桑（Bellassen）先生合作编写了一本新的教材，起名叫《汉语语

言文字启蒙》。这本书保留了汉字可以构词的特色，所以我在书的封底上写了这样一段画龙点睛的文字：“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汉字是表意文字，个体突出，以单个汉字为基础可以层层构词，故本教材可称为‘字本位教学法’”。这套教科书出版后销售不错，不少学校，尤其是中学都改用了这套新教材。为了检验这套教材的效果，我在巴黎七大试用了一年。通过一年的课堂教学实践，我发现学生口语学得并不轻松，听说能力也没有明显的改善，一本书才学400个汉字，学生的阅读能力也不可能很强，我感觉好像还是没找到最合适的方法，尤其是汉字，学生还是觉得读和写都很困难。带着这个疑问我1991年秋回到了中国。

回国后我继续在北京语言学院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但此时我有了一个目标，这就是要解开汉语难学之迷。当时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件十分引人注目的事件，这就是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大讨论。这件事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本人每天都在教外国人汉字，如果汉字“将寿终正寝了”，那我们还研究汉字教学干什么？另外，我在法国时亲身体会到西方人对汉字的热爱，所以我本能的反应是汉字是不能改革的，是不能丢弃的，我们应研究的是解决汉字教学的方法问题，于是我开始阅读发表在《汉字文化》上的有关文章。通过阅读相关论文，我发现文改派所依据的语言文字理论有问题，如“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提法就有问题。因为按照这一提法，中国历史上是不应该存在言、文不一致的现象的。有位著名语言学家说“中国历史上言、文不一致是不正常的现象”，这我就不明白了，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年的语言文字现象怎么能说是不正常的呢？到底是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不正常，还是文字的定义有问题，我产生了疑问。另外，中国汉族方言众多，如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那汉族应该有多种文字才对，怎么使用一种文字呢？为什么讲多种方言的人能“书同文”呢？于是我参加了这场大讨论，在《汉字文化》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论文《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区别、联系和相互转化》。

因为我在山东大学进修时学过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知道我国语言学的理论是从索绪尔那儿来的，于是我又开始认真研读索绪尔的著作，而且还读了我在法国买的索绪尔原著。我发现索绪尔的眼光是很敏锐的，他发现“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字却有停

滞不前的倾向”，^①也就是说，他看到了语言和文字发展的不同步性，语言和文字是不一致的，但索绪尔还是坚持“文字表现语言”。我感到索绪尔对文字的论述有自相矛盾之处，因为如果“文字表现语言”的话，那文字和语言的发展就应该是同步的，应该总是保持一致的，怎么能不同步，不一致了呢？不久我又发表了《评索绪尔对语言和文字之间关系的论述》一文。

我参加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大讨论的初衷并不是想议论出个谁是谁非，而是想搞清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因为我们从事语言文字教学的人是要遵循理论的，如果连文字是什么，连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都没搞清楚，我们怎么进行汉语和汉字教学呢？令我没想到的是我在《汉字文化》上发表的文章给我惹来了麻烦，有人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提法是公理，你怎么能怀疑公理呢？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你怎么敢怀疑他的理论呢？好心的同事私下对我说，你别再写有关汉字的文章了，言外之意是别在《汉字文化》上发表论文了，否则对自己的前途不利，当时在学校我也确实感受到了压力，于是我决定先不发文章了，而是从考察教学实践入手，看看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

通过参加大讨论，我逐渐认识到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而且语言不决定文字，语言和文字是相对独立的，也就是说，汉语和汉字是相对独立的，汉字是一个独立于汉语的视觉符号系统。此时我的“字本位”观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从汉语的“字本位”观转变为中文的“字本位”观了。通过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字教学史，我发现我国古人一直是根据“字本位”的原则来进行中文教学的，于是我感到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不是“创新”，而是要“回归”中国文字教学的传统。

中文是“字本位”的，汉字字形是一个由构件组合的系统，用汉字书写的中文也是一个“字”与“字”的组合系统，我国前人一直重视研究汉字字形系统，而且也重视研究识字教学的方法，因为他们知道阅读能力的强弱取决于所掌握的汉字数量。对于提高外国人汉字的读写能力，我感到也应该让他们了解汉字的字形系统，也应该让他们多识字，快识字，于是我用许慎《说文解字》的材料编

① 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52页 商务印书馆 1982

写了《汉字书写入门》一书，又借鉴古代《千字文》的方法编写了一本《现代千字文》。与此同时，我发现我们的教材之所以不系统地进行汉字字形教学，不讲以“字”构“词”，主要是我们的教材采用的是“语文一体”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是“文从语”的，是不把汉字看作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的，所以要想把汉字作为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来教，就必须把“语”和“文”分开。我在翻阅文献时也发现有些专家也曾指出过“语文一体”的弊病，而且在五十年代也曾进行过“语文分开”“先语后文”的教学实验，最后他们还是否定了“语文分开”的做法。

“语文一体”的弊病我身有体会，但“语文分开”到底如何我没有切身的感受，我想尝试一下，于是我就用自己的教材亲自进行了实验。在实验中我不断改进教材和教学设计，最后终于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外国人学习汉语和汉字不仅由“难”变“易”了，而且还由“慢”变“快”了。本书中《语文分开，集中识字的教学思路和具体做法》就是当时教学实验的总结。不久，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口语速成》《集中识字》和《常用汉字部首》三本一套的新教材。

教学实践是检验教学模式的唯一标准，教学实践证明“语文一体”的教学模式“语”和“文”相互阻碍，而“语文分开”“语文分进”的结果，既利于“语”的教学，又利于“文”的教学，“语”和“文”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

教学理念决定教学模式，语言文字的教学理念源于对语言文字的理性认识。“语文一体”的教学模式是有语言文字理论支撑的。“语文分开”“语文分进”的教学模式实际上颠覆了这一理论。此时我突然明白了在法国我和白乐桑编写的那本教材的问题所在，就是没有把“语”和“文”分开，是“语文一体”所致，此时我仿佛看到了解开汉语难学之迷的一丝曙光，好像有一种发现新大陆的兴奋感，同时我也意识到原来长期以来所谓汉语难学的问题其实是源于我们所接受的语言文字理论，于是我开始深入地研究语言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问题，尤其是关于文字的概念以及语言和文字之间关系的问题。不久，我又在《汉字文化》上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

二

言，心声也；书，心画也。

——扬雄《法言》

可以听到的或时间性的东西（言语），可以看到的或空间性的东西（文字），各有自身的基础，并且它们首先具有同样的价值。

——黑格尔《哲学全书》

“语文一体”的教学模式“语”和“文”是不分的，是“文从语”的，是不把汉字作为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的，是只教“词”，不教“字”，是“词本位”，不是“字本位”，所以不讲以“字”构“词”，不向学生介绍汉字的构形系统，结果，学生觉得汉语汉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字。多年来，我一直使用“语文一体”的教材，亲眼目睹了外国人学习汉语汉字的艰难，亲身体察到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

明明中文是一个字一个字写成的，为什么“字”在教学中就没有地位呢？明明汉字字形是有结构的，成系统的，为什么汉字就不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呢？为什么非要“语文一体”呢？为什么“文从语”呢？为什么文字教学一定要服从语言教学呢？我发现这些都与从国外引进的语言学理论有关。上个世纪初西学东渐，西方语言学进入了中国，于是一批留学欧美的语言学家主宰了学术界，时至今日，大学课堂上仍在讲授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文字表现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等说法还在作为公理被奉为语言学的金科玉律。我国某些语言学家也说“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根据这种理论，语言决定文字，文字是从属于语言的，文字的本质是字音，语言和文字是一体的，是不能分开的，文字仅仅是语言的代表，是没有自己独立地位的。

文字表现语言吗？文字代表语言吗？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吗？文字的本质是字音吗？我认为这是基础理论问题，如果“文字的本质”或者说“文字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搞不清就不能把语言和文字区分